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毛泽东

交往纪实

于俊道◎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毛泽东

交往纪实

主 编：于俊道 副主编：钟 辰 夏 鹭 叶 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交往纪实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61-1862-7

I. ①毛… II. ①于…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047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斌
特约编辑 高 蕙
责任校对 詹福松
责任印刷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69千字
定 价 4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毛泽东和周恩来	钟 辰	1
领袖之间——毛泽东和朱德	翟 录	6
情谊与合作的一面旗帜——毛泽东和宋庆龄	吴传煌 王保清	8
追求真理 心心相通——毛泽东和瞿秋白	刘武生	14
“关键的一票”——毛泽东和王稼祥	钟 辰	25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毛泽东和张闻天	叶文琴	30
“你现在仍然是我的老师,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和徐特立	陈志明	37
“保存精力 长期奋斗”——毛泽东和谢觉哉	王定国	39
“好好读几本书”——毛泽东和薄一波	未 名	43
“西藏人民的引路人”——毛泽东和阿沛·阿旺晋美	丛 编	45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和李大钊	叶 兰	48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和陈独秀	唐春元	52
患难与共 肝胆相照——毛泽东和蔡和森	罗绍志	57
“你写的文章不像从前那样有锋芒了”——毛泽东和李达	陈力新 李梅彬	65



“代英是个好同志”——毛泽东和恽代英	田子渝	69
“我同意去西南”——毛泽东和彭德怀	郝和国 侯俊智	73
伟大的决策——毛泽东和贺龙	翟作军	78
“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和陈毅	翟 录	81
“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毛泽东和罗荣桓	钟 辰	85
“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毛泽东和徐向前	巴 江	90
在城南庄的日子里	聂荣臻	92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和叶剑英	范文摘	99
博大的胸怀——毛泽东和陈赓	师振中 初 军	102
要做“世界之友”——毛泽东和许世友	钟 辰	106
毛泽东指引我走上革命路	彭绍辉	108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和蔡元培	高平叔	114
“神交已久”——毛泽东和张澜	吕光光	123
两位政治家的促膝长谈——毛泽东和黄炎培	尚 丁	129
精兵简政 共渡难关——毛泽东和李鼎铭	惠金义	137

诗友——毛泽东和柳亚子	夏 鹭	140
“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毛泽东和章士钊	夏 鹭	143
“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梁漱溟 的回忆	梁漱溟	149
在党与非党友谊往来上的老朋友——毛泽东和章乃器	林涤非	153
“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毛泽东和冯玉祥	郑继栋	155
为国为民 彼此心同——毛泽东和张治中	夏 鹭	158
推心置腹谈功过——毛泽东和傅作义	夏 鹭	167
“是毛主席挽救了我”——毛泽东与董其武	董其武	170
“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刘斐的回忆	刘 斐	175
落叶归根 藉图良晤——毛泽东和卫立煌	赵荣声	179
走革命之路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与郑洞国	郑洞国	186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和鲁迅	汪太理	190
挚友和诗友——毛泽东和郭沫若	吴正裕	197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和丁玲	夏 鹭	199
“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毛泽东和萧军	王德芬	203



“《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毛泽东和周谷城 萧 雪	213
“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毛泽东和谈家桢 张光武	223
“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毛泽东和杨昌济 钟 辰	226
“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和王季范 赵志超	228
“我在他手下读过书哩”——毛泽东和毛麓钟 赵志超	231
瓜葛五十年——毛泽东和张干 何其烈 张祖璜	234
同窗挚友 情深谊长——毛泽东和周世钊 周彦瑜 吴美潮	242
胸怀坦荡 不抱偏私——毛泽东和彭璜 沈学明	250
为早年的革命战友立墓——毛泽东和罗哲 湘 办	252
平凡见真情——毛泽东和宛希先 熊安余 桂遇秋	254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和蔡畅 苏 平	257
萍水相逢 终生朋友——毛泽东和许志行 严永顺	261
“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和李振翩 李 晨	264
双重情谊——毛泽东和李淑一 钟 辰	265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毛泽东和杨开慧 叶 兰	267

“你当初为什么要走呢”——毛泽东和贺子珍	叶 兰	276
父子情——毛泽东和毛岸英	叶 兰	285
人间自有真情在——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	叶 兰	295
融合在阳光、自由、欢乐之中——毛泽东和刘松林	叶 兰	300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毛泽东和文运昌	钟 辰	307
“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毛泽东和陈玉英	钟 辰	308
伟大的历史性会晤——毛泽东和斯大林	费德林	311
重逢在北京	埃德加·斯诺	317
“请白求恩大夫立即帮助组织医疗队吧”——毛泽东和白求恩	瞿 录	327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比喻像他那样尖锐,那样富有诗意”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329
“他是个重视美感的人”——毛泽东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334
“人类中的一个伟人”——毛泽东与诺罗敦·西哈努克	诺罗敦·西哈努克	336
“您的著作已经推动了国家,也改变了世界”——毛泽东与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	341
“你真的应该来看我”——毛泽东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343
“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与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346

“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的生涯中亲密合作、同舟共济 50 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他们最早相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叶。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政治讲习班理事、代理理事长。周恩来先是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又担任国民政府东江行政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实现国共合作、推动北伐的共同事业中，他们之间有了来往。1926 年 3 月 20 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商讨时局。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结果未被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采纳。

1927 年中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第二年 4 月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会师，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六大”后，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后又兼军事部长，实际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但周恩来了解并且佩服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多次代表党中央肯定和支持处于逆境中的毛泽东。

1929 年 6 月，红军第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建军原则等重大问题，红四军领导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被与会多数同志接受。最后在选举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了，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不随红军行动。新任前委书记陈毅于 8 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集的军事会议，并向周恩来等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问题。周恩来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强调指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



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他还审定了陈毅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让陈毅带回根据地；并嘱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同年11月毛泽东回到了前委工作，他报告中央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随即，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并起草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解决了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毛泽东还新当选为前委书记。1930年2月1日，周恩来在起草中央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毛泽东的复职，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这可以看出当时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南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指责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在指挥红军时“忽视阵地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并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毛泽东旋又被解除了军权，仅保留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1932年初，中央又决定毛泽东离职养病。在红军受挫后，又是了解毛泽东的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收拾危局。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领南昌、杭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来在到达中央苏区后，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听取了毛泽东的分析，致电临时中央，表示目前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回电坚持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城市攻打。在苏区中央局的讨论会上，毛泽东持反对意见。但中央最后还是通过了攻打赣州的决定。结果城未攻克，伤亡却很大。经过这次教训，周恩来更加深信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军事行动上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不满，尤其严厉批评毛泽东。后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方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毛泽东、周恩来朝夕相处，推心置腹，彼此敬重，合作融洽。7月25日，周恩来不赞成中央局要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指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由毛泽

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29日，周恩来再次写信给中央局，力主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指出“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受到批评。中央局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作检讨的同时，坚决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指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在两种办法中选其一：“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办法，中央局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被撤销了。周恩来看到离职的战友，想到红军的前途，心境难以诉说。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不久，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惨重，尤其是湘江之战，伤亡过半。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他十分关心战友毛泽东的安危，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他立即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渡江。毛泽东也十分关切地对他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每当临危关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首先想到了对方，他们都深深知道中国革命的成功需要对方。

突出湘江重围后，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交换意见。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周恩来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同意。在黎平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再一次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放弃了原定计划，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使得中央红军从被动局面中摆脱了出来。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出面提出，并得到洛甫、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周恩来在会上作副报告时，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和李

德。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错误在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方向。周恩来等人也先后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他曾回忆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大家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后来，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曾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

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通力合作，领导中国革命一步步地走向胜利。1935年10月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遇相知的密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齐心协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辛的开拓。他们在交往中仍然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纪念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34周年，毛泽东特地参加了在庐山人民剧院举办的建军晚会。华灯初上时，毛泽东驱车来到剧院门口，一下车就问门卫：“总理来了没有？”当有人告诉毛泽东，周恩来总理正在路上散步，等一会儿就到时，毛泽东笑着点点头，随

手端过一只板凳坐在剧院门口，并对身边的警卫员说：“等一等总理，我们一起进去。”

一天傍晚，周恩来外出开会。司机为节省时间，在前面没有车的情况下，加快行车速度，将总理很快送到会场门口。周恩来下车后，发现毛泽东的车子也随后赶到了。周恩来等候毛泽东进场后，才进入会场。散会后，他在行车途中，严肃地对司机说，以后我们行车特别是在夜间时，要注意一下前后，如果发现主席的车子在后面来了，一定要主动让车。

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了晚年更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1972年1月毛泽东患重病，周恩来得知后，心急如焚，亲临抢救现场，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同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患了膀胱癌。毛泽东看到会诊报告后，眉头紧锁，表情十分严肃，随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并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等负责医疗组的工作。周恩来生病住院后，毛泽东时刻关心和惦记他的病情。还曾派人给总理送去沙发。此时，毛泽东的身体也不好，并患有眼疾，但对总理的病情报告每次都十分注意地听，常让秘书打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病情、起居、饮食等情况，并表示问候。周恩来也曾将自己的病情亲自写信报告毛泽东，好使主席放心。他们就是这样彼此关心着，度过了他们合作的最后岁月。

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活动最猖獗的时候，仍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他们政治上相互信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对此十分不满。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借所谓“风庆轮”问题，向邓小平发难，逼迫邓小平表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得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此时周恩来病重住院。10月18日，江青等人又派王洪文赶往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告周恩来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等等。毛泽东听了后，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你回去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周恩来在医院得知后，找中央有关同志谈了话，并通过王海容、唐闻生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10月20日，毛泽

东要陪同外宾到长沙的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王洪文也参加了汇报。毛泽东当面批评了王洪文，并赞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邓小平为党的副主席。这次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单独进行了交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要周恩来告诉邓小平，由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由于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被挫败。

这是两位老人50年交往中的最后一次单独交谈。

(钟 辰)

领袖之间

——毛泽东和朱德

毛泽东和朱德这对亲密战友，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1928年初，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住在房东谢槐福的家里。后来朱德来到了茅坪，毛泽东就主动地搬到对面山上谢慈理家里住，把原来自己住的比较大、比较好的房子让给了朱德。这年冬天，红四军在宁冈新城整训一个多月，毛泽东经常在整训休息的时候，与朱德一块下棋、谈话。他们边下边谈，下完了，不管哪个赢了输了，他们都要哈哈大笑一阵。

1930年10月，红军打下了吉安。毛泽东和朱德同住在西刘家巷11号房子内。后来因为敌人飞机轰炸得厉害，他们都搬走了。毛泽东搬到了一个叫“源记”的布店里去了。毛泽东刚一进门，就亲切地跟店员们打招呼，并向他们要了纸笔，伏在柜台上，写了一封署有“毛泽东”名字的短信，叫通讯员马上送给朱德。两位革命领袖刚刚分开，就要写信联系，可

见他们之间是多么的亲密。

在长征路上，张国焘猖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一次，张国焘气势汹汹地用手枪威胁朱总司令，要他反对毛泽东，反对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议。这遭到朱总司令的严词拒绝。同时，朱德还耐心地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讲全国的抗日形势，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指战员要听党的指挥，听毛泽东的指挥。由于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阴谋被粉碎了。毛泽东对朱德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的高尚革命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意志坚如钢，度量宽似海”。

全国解放后，两位领袖的革命情谊更日益加深。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3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步行20余里，登上险峻挺拔的五老峰后，赋诗抒情，诗中说：“行游险处防盲目，向导堪称指路碑。”朱德用形象的语言，热情地歌颂毛泽东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好向导，是中国革命的英明领袖，教育人们永远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革命道路前进。

1961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朱德从北京来到庐山，还没有住下，也没有休息，洗洗脸就首先到毛泽东住的地方看望他。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派人给朱德送去了湖南的烟熏肉，让朱德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1962年，朱德在南昌视察工作，住在滨江宾馆1号楼。听说毛泽东也要到南昌来，朱德便很快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准备把1号楼让给毛泽东住。后来毛泽东知道朱德住在这里，怕打扰他，连车也没有下，在电话里问候了一下，便赶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揭穿林彪、“四人帮”的阴谋，针对他们一伙诬蔑朱委员长是“大军阀”、“大党阀”、“黑司令”的无耻谰言，毛泽东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问朱委员长：“你究竟是黑司令还是红司令？”朱委员长回答说：“人家说是黑司令。”毛泽东说：“这也很怪，你当司令，我当党代表，你是黑司令，我是什么？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

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是这样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事业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革命情谊。

（翟 录）

情谊与合作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和宋庆龄

毛泽东与宋庆龄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尽管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毛泽东与宋庆龄各自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1919年底至1920年初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从1927年下半年开始了这个转变。毛泽东与宋庆龄在1927年下半年之前，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情谊；在这之后，形式上仍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情谊，实质上是党内外共产主义者的情谊。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宋庆龄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里所说的“很早”，似应早到1927年下半年。

毛泽东与宋庆龄的情谊是从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他在大会上就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为孙中山所采纳。大会期间，宋庆龄虽在上海，与毛泽东缘悭一面；但是，她与毛泽东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大会开幕前，宋庆龄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右派利用她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决心的企图，支持和帮助孙中山以革命家的气魄在大会上制定三大政策，提出让大会举手通过的、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名单。在国共首次合作伊始，他们都把对方引为战友，已是神交了。

然而，国共合作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反对。1925年11月，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要取消共产

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开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为了反击他们的进攻，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广州，于1926年1月8日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与宋庆龄在大会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宋庆龄大声疾呼大家要加强团结，不要受右派挑拨，指出：“如果诸君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诚地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毛泽东理直气壮地声明，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公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国民革命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会议痛击了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加紧了反革命活动。1927年3月，毛泽东与宋庆龄等促成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党，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挫败了他的阴谋。对此，蒋介石极端仇恨，于4月12日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22日，毛泽东与宋庆龄等39人联合发出讨蒋通电，愤怒谴责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指出，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在阶级搏斗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的抗议，于7月15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1日，宋庆龄领衔与毛泽东等22位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宣言，揭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宋庆龄与毛泽东团结一致，捍卫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而他们的革命情谊也升华到新的高度。

蒋汪合流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长途跋涉，访问了苏联，并把抗议传到国外。毛泽东根据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宋庆龄与毛泽东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岗位，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但他们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9月19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称赞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暴动“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坚信“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